

中山市博物馆丛书之三



神话 · 考古 · 历史

张潮 著



文物出版社

中山市博物馆丛书之三

神话 · 考古 · 历史

张潮 著

 文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话·考古·历史 / 张潮著. —北京: 文物出版社,
2015. 10

(中山市博物馆丛书; 3)

ISBN 978 - 7 - 5010 - 4377 - 4

I. ①神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史前文化 - 研究 -
中国 IV. ①K210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0982 号

神话·考古·历史

著 者 张 潮

封面设计 周小玮

责任印制 张 丽

责任编辑 宋 丹

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

邮政编码 100007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 印张 16.25
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10 - 4377 - 4

定 价 90.00 元

本书版权独家所有，非经授权，不得复制翻印

目 录

引言 神与人	1
壹 说天圆地方	12
贰 论上古的日月崇拜	29
叁 神话成双成对性之一 ——扶桑与若木	48
肆 神话成双成对性之二 ——金乌与凤凰	69
伍 神话成双成对性之三 ——虎神与蟾蜍	92
陆 巫之转变 ——神巫王巫	107
柒 礼乐制度的起源	125
捌 辛、帝、商释义	148
玖 黄帝、伏羲、后稷略论	160
拾 关于先商文化的思考	168

拾壹 公刘、公亶父与先周文化	196
拾贰 楚文化与商周文化	214
结语 图案·夏文化	231
参考文献	249

引言 神与人

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，我国古代也有着优美动人的神话。这些神话得以流传至今，大概通过这样三条途径：

1. 语言讲述过程；
2. 图像表述过程；
3. 文字记录过程。

以上过程既相对独立，又互为依存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。它们之间的逻辑顺序的排列应是：语言讲述过程→图像表述过程→文字记录过程。

众所周知，我国古代神话产生进而兴盛的重要时间是在氏族社会时期，约处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。此一阶段，生产力落后，生产条件低下，生存环境恶劣。受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，氏族成员前行的道路充满曲折。艰难的历程，“血与火”的洗礼，使得氏族成员在对氏族英雄人物加以歌颂赞扬，对美好生活憧憬向往的同时，也对所见自然现象、动物、植物、山川、河流等产生了奇妙的崇敬和畏惧。于是，痛苦与欢欣的情感纠缠交织在一起，冲刷着他们的心灵，再加上原始思维方式的催化，便结晶出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。而起初只有一些刻划符号出现，其性质类似于上古结绳记事（图一）^[1]。因刻划符号太过简单，尚不足以当做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，神话就凭口耳相传，以语言

[1] 对上古的刻划符号，存在很大争议。主要有两种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是原始的文字，另一种意见认为是记事符号。恐怕除极少数外，这些符号还是多用于记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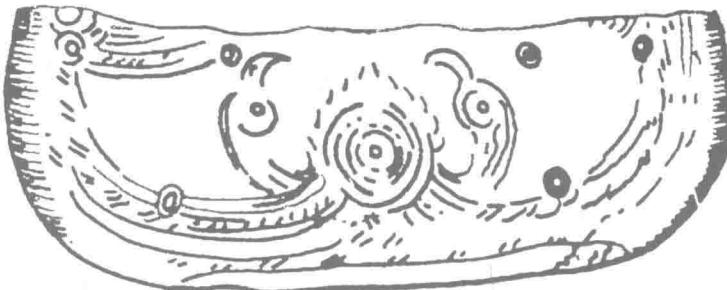
图一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刻划符号

讲述的方式传播流布。

当人们掌握了绘画技巧后，便多了一种抒发情感的手段，神话开始出现在图像中。这种图说想象世界的表现方法，在我国古代器物纹饰、原始岩画、丝绸帛画、画像石上比比皆是。例如：河姆渡文化的“双鸟载日”图（图二），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，曾侯乙漆箱的“后羿射日”图等，无不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。被视为“古之巫书”的《山海经》，更是以图文并茂著称，其文字部分多用来说明图画——包括对各类神话图画的解释。该书的神话内容，至今引人注目。相传屈原的《天问》诗篇，就是针对楚宗庙祠堂的壁画有感而发。王逸注《楚辞》提到：

屈原放逐，忧心愁悴。彷徨山泽，经历陵陆。嗟号昊
旻，仰天叹息。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，图画天地山
川神灵，琦玮谲诡，及古贤圣怪物行事。周流罢倦，休息
其下，仰见图画，因书其壁，呵而问之……

《天问》涉及的大量神话故事，无疑曾通过绘画的方式展现出来。



图二 河姆渡文化的“双鸟载日”图

凡此可证，图像表述是我国古代神话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。

接下来，是文字记录神话的过程，神话终于可以写成篇章传颂留存。我国目前已知的较早较成熟的文字，是商周的甲骨文和钟鼎铭文。其内容绝大多数与祭祀、征伐、田猎、求雨、赏赐有关，间或提及神话人物、神话珍禽，如卜辞之“高祖夔”、“帝使凤”，但所占比例甚少。这大概是由于神话未能登上大雅之堂所致。
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儒、法、墨、道，学派迭起；诸子百家，著书立说。汉代神学思潮弥漫，文人笔底又生花。由《庄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书载录，古代诸神，方才日渐显露真容。但这距神话产生的年代毕竟相去太远，巨大的时间差，不免给神话羼杂了其他成分。

日益增多的考古资料表明，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覆盖面相当广泛。据统计，遗址数目超过六七千处^[2]，遍及神州大地。苏秉琦先生在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一书中，将我国的考古学文化化分为如下六大区系：

1. 陕豫晋邻黄地区；
2. 山东以及邻省一部分地区；
3. 湖北和邻近地区（汉水中游区、鄂西区、鄂东区）；
4. 长江中下游地区（宁镇区、湖区、宁绍区）；

[2] 安志敏：《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2页。

5. 以鄱阳湖——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（赣北区、北江区、珠江三角洲）；
6. 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（昭盟中心区、河套区和陇东中心区）。

它们包括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，长江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，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，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，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、良渚文化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，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等等。

上述文化体系，各有自身的文化发展序列，形成了多个中心（图三），分别打上了不同氏族和部落的鲜明烙印。一般而言，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，神话是一定会孕育产生的，世界各民族几无例外，只是内容形式不同罢了，没有理由出现一段历史空白。按照常理推测，绚丽的文化之花，必将结出丰硕的文化之果。既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如此发达，既然我国上古有如此众多的族群存在，那么，相应的神话传说就应当十分丰富完整。

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

治神话学者普遍感到，较之希腊神话而言，我国古代神话似乎显得过于零散，不成系统，未写成专书；一些事情、事件、人物关系模糊不清，有的甚至相互混淆，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，矛盾百出。这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？

——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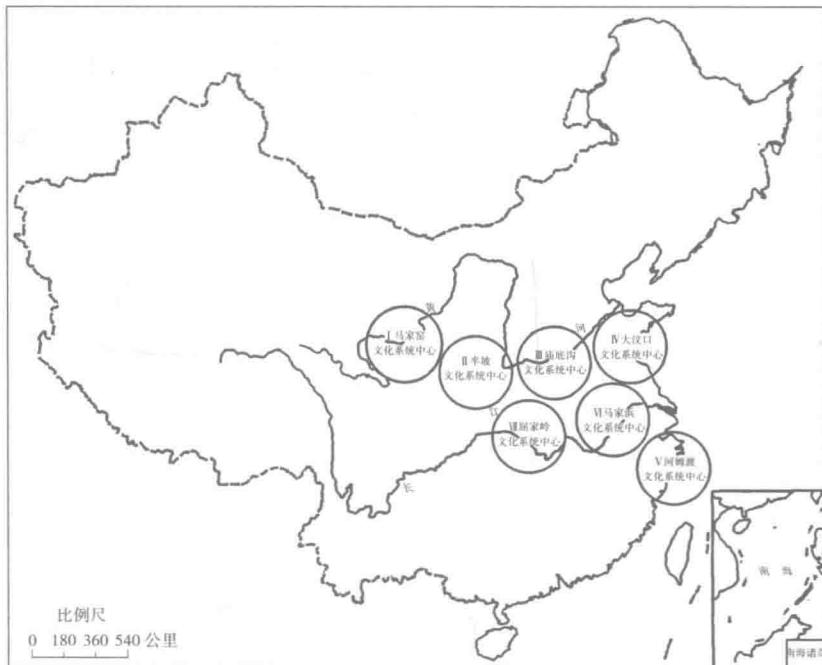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“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”^[3]。

显然，社会原因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。

这里，搁置社会原因暂不论。单从神话传播途径本身来看，实际上也可找出问题。

由于语言讲述过程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，神话传说往往通过一个或者几个人传给一群或几群人，不仅传播面窄小，还不易记识，且会遗忘；图像表述过程虽然更进一层，将神话传说

[3]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0页。



图三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多中心发展示意图

(佟柱臣：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》，《文物》，1986年第3期）

以画面形式“定格”，但久而久之，论者又要花十倍百倍力气释读，况且理解还未必一定正确。总之，这两种传播过程既有积极意义，又有很大制约性。积极意义的表现是，保证了一部分神话的传承延续；制约性在于，容易随着环境对象的改变而引起神话的中断和缺失，导致一部分神话传说呈递减趋势，直至逐渐消失。

并且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，这两种传播过程都与氏族的盛衰直接关联。每一个氏族的强盛壮大，相应为神话传播创造了条件，氏族中流传的神话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；反之，氏族中流传的神话便缺少“养分”，紧随着氏族的衰败而被边缘化，然后为流逝的岁月所淹没。

这样，后起的利用文字记录下的神话，主要部分应该是建立

起统治王朝的一族和几族的神话，即“正统神话”^[4]。如果仔细加以分析，我国这种“正统神话”，比较突出的是炎帝系统和黄帝系统^[5]。尽管这两大系统不能尽显我国古代神话的全貌，但它们自始至终作为我国古代神话的主干之一直立挺拔。从这个角度观察，所谓我国古代神话的“零散现象”，实际上并不零散，多数寻得着条理，多数都有内在联系，似可看成围绕这一主干生长出的许多枝枝叶叶。

有必要指出，我国的“正统神话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反映。诚如鲁迅先生所言，是重实际，讲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，实用性的产物^[6]。商周王朝甲骨文，青铜铭文，偏重于记事、记史，即使打着神事的旗号亦少例外。周人说，“惟殷先人，有典有册”^[7]，周人自己也提高史官的地位。因此，很难说这种注重历史的情况，没有对我国古代神话的传播起到强烈的影响作用，更何况尚未见到我国古代有成系统的记载神话的专书问世。

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，在我国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，天与人的争辩曾相当激烈。商人敬天，周人敬天保民，荀子提出天人之分，董仲殊则将“天人之际，合而为一”。这表现出一种观念上由天向人的重大转变，这种重大转变一旦发生，也很难说不对我国古代神话的传播起着强烈的渗透作用，更何况争论的内容多少也与神话密切相关。

由此一来的必然结果是导致神向人的转变，神话转化为历史。需要点明的是，在这里，神话是从属于历史的，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我国古代神话转化为历史的主要方式，袁珂先生在《中国古

[4] 参见袁珂：《中国古代神话》，华夏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8页。

[5] 参见叶绪民：《上古神话中神族谱系探源》，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》，2001年第6期。

[6]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0页。

[7] 《尚书·多士》。

代神话》一书中说得非常明白：“或者是把神来加以人化，把神话传说加以理性诠释，或者是把历史发展中的进步过程，创造发明，穿凿附会于一神乃至几神身上。”

归根结底一句话，千方百计让神从天上降临人间。

考察我国古代神话向历史转化的过程，大概可以分成下面两个阶段。

第一是发生发展阶段，时间约在商代至战国时期。

这个阶段，神话一方面大量出现，一方面又受到冲击，有时神与人简直难以区分。“后土原是地神，却也是共工氏之子；实沈原是星名，却也是高辛氏之子……夔本是九鼎上罔两，又是做乐正的官；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，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”^[8]。

第二是基本完成阶段，时间约在秦汉时期。

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五帝系统开始出现，五帝前承三皇，后启三代，成为我国历史上的重要环节，“有根有据”过渡下来。这种帝系统的确立，当然应该划入历史的范畴了。

历史学家司马迁可谓完成我国古代神话向历史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怀着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^[9]的宗旨，通过演绎归纳，将黄帝排在本纪之首，依次加上端顼，帝喾，帝尧，帝舜，写进不朽巨著《史记》之中。他的五帝系统给后世以极大影响，从此，神被列于正史里，走进了人的历史殿堂。

于是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现象。我国古代神话虽然转化为历史，但其中躁动的神因子并不能就此一笔抹杀，而是沿着双向轨迹发展，具有双重特点，即神既有神的特点，又有自己的特点。如下图示：

[8] 顾颉刚：《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》，《古史辨》第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60页。

[9] 《报任安书》。



我国古代神话的双重特点，随之而来，又使其具有双重性，神的威力和人的威力都在发挥作用，具体表现为：

其一，神秘性，笼罩五光十色的神秘色彩。神话中多见离奇之人，怪诞之事。伏羲女娲“蛇身人面”^[10]；“帝江状如黄囊，赤如丹火，六足四翼，混沌无面目”^[11]；“蚩尤兄弟兽身人语，铜头铁额”^[12]；“鲲鱼化为鹏，鹏之背不知几千里”^[13]。此类例不胜枚举，字里行间，可见想象张开羽翼在神的王国里翱翔。如果深入一层分析，这之中涉及的内容实在广泛，再现了处于原始萌芽状态的宗教信仰、哲学思想、文化面貌、艺术风格、科学技术水平……

其二，写实性，深沉而凝重。是上古初民在漫长历史道路上为生存而斗争的真实写照。女娲“炼五色石以补苍天”^[14]，燧人氏“钻木取火”^[15]，有巢氏“构木为巢”^[16]，“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”^[17]，“禹尽力沟洫，导川夷越”^[18]……充分体现出勤劳勇敢的美德、顽强抗争的毅力、坚韧不拔的精神、无所畏惧的气概，是大写的人，是集体的智慧。

我国古代神话转化为历史，或者说，它们和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已经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。但这种转化和不可分割性究竟达到了什

[10] 《列子·黄帝》。

[11] 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。

[12] 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十九引《龙鱼河图》。

[13] 《庄子·逍遙游》。

[14] 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。

[15] 《太平御覽》卷八六九引《博物志》。

[16] 《韩非子·五蠹》。

[17] 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。

[18] 《拾遗记》。

么程度？能不能加以认识？能不能从中再复原出一部分历史来？

根据文献典籍保存下来的神话资料看，我国古代神话所反映出来的历史，似可分为两大部分：

第一部分基本为神话自身发生发展时期的历史，大多属于氏族社会的史迹，表现较为明显：有的是说氏族的图腾崇拜，如夏禹是其母修己“吞神珠如薏苡，胸拆而生”^[19]；商契是其母简狄“吞玄鸟卵而生”^[20]；周后稷是其母姜嫄“履巨人迹而生”^[21]。有的叙述氏族的农业耕作，如“神农教耕五谷，以致民利”^[22]。有的记载掌握科技知识所花费的心血，如夸父追日影，“与日逐走”^[23]。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神话数量居多。

第二大类基本为后来添加附会的历史，已经超出氏族社会的界限。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神话数量虽不算太多，但还是留有斑斑痕迹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《淮南子·主术篇》记炎帝：“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东至场谷，西至三危，莫不听从。当此之时，法宽刑缓，囹圄空虚，而天下一俗，莫怀奸心。”辽阔的地域，加上刑法、监狱等严厉的统治手段，明明是国家形成以后的历史，却被放到炎帝时代——通常指传说中的“英雄时代”，应该能说明问题吧。

归纳起来，我国古代神话转化成历史的那一部分，既有蒙昧时代，野蛮时代的影子；同时又有文明时代的影子。二者常相互杂糅，内容则真伪混合，未加甄别，便对其充分肯定或者轻易否定，都难免有失。

还有一点长期为人们所忽视，即成双成对性，但这无疑属于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大特色。言人物则炎帝——黄帝，言神树则若

[19] 《世本·帝系篇》。

[20] 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。

[21] 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。

[22] 《管子·形势》。

[23] 参见徐南洲：《山海经——一部中国上古的科技史书》，《山海经新探》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89页。

木——扶桑，言太阳鸟则金乌——凤凰，言月精则虎（於菟）——蟾蜍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？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？个中某些密码是否尚未解开？实在值得深思。

又必须指出的是，在我国上古原始宗教信仰中，日月崇拜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，它们多以并行并列的方式呈现，多见于一种复合图案。关于这方面的认识，就目前的现状看，是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加深的。

上古神话与历史的不可分割性，涉及多个层面，内容较广泛，需要探讨的问题不是一个两个。其中如族群的起源，氏族英雄人物的产生，文化的交流融合，巫史的地位及作用，礼乐制度的产生等就颇值得关注。它们既混含在神话传说里，又散见于史家笔端上；它们那环环相扣，递进式发展，连续性强，时代鲜明的特点，相互串联，汇集成了幅动态的画卷，在中华文明史上不断放射着耀眼夺目的光芒。

要深入挖掘那一段历史，自然不是简单的事情，单靠一两个学科恐怕不够，多学科的结合是必需的，至少得重视神话学、考古学、历史学的交叉结合。怎么个结合法？似可用神话学的眼光读史，用历史学的眼光读神话；那么考古学呢，会不断发掘出新的资料，带给我们新的惊喜，让我们看到往事遗篇的光芒。这时，器物的分析排队是必需的（地层学、类型学），但穿越时空进行精神层面的对话更不可缺少。

方向既已明确，从何入手颇费思量。名曰《神话·考古·历史》，理应由天而神，由神而人逐步渐进。冯友兰先生著《中国哲学史》，曾对天字的含义有专门论说：“在中国文字中，所谓天有五义：曰物质之天，即与地相对之天。曰主宰之天，即所谓皇天上帝，有人格的天、帝。曰运命之天，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，如孟子所谓‘若夫成功则天也’之天是也。曰自然之天，乃指自然之运行，如《荀子·天论篇》所说之天是也。曰义理之天，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，如《中庸》所说‘天命之谓性’之天是也。《诗》《书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所谓之天，除指物资之天

外，似皆指主宰之天。《论语》中孔子所说之天，亦皆主宰之天也。”

由此可见，天的内涵之丰富，影响之深远，实在是大得很。夸张一点说，若不谈天地、日月崇拜，中国上古文化、哲学史乃至整个上古史几乎很难成文。即便成文，也会感觉稍嫌欠缺，力度不够。所以斟酌再三，决定还是从人们最初的原始认识——天圆地方下笔，次第展开，以回望峥嵘岁月，追寻华夏文明的曙光。

壹 说天圆地方

中国古代对宇宙结构的探索有三大学说——盖天说、浑天说、宣夜说。相比较而言，在这三大学说中，以盖天说产生的时间最早，并很快为人们所接受认同，影响亦深入持久广泛。

所谓盖天说，简而言之就是将天看做圆形，地看做方形，俗称“天圆地方”。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较多，试作梳理分类如下：

第一类，通过比附来指明天与地形状。

《吕氏春秋·序意》：

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，爰有大圜在上，大矩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。盖闻古之清世，是法天地。

《周礼·冬官·考工记》：

轸之方也，以象地也；盖之圜也，以象天也。

《周髀算经》卷上：

方属地，圆属天，天圆地方。方数为典，以方出圆，笠以写天。

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：

又《周髀》家云：天圆如张盖，地方如棋局。

由此类记载可知，天的几何形状像车盖、伞盖或斗笠，近似